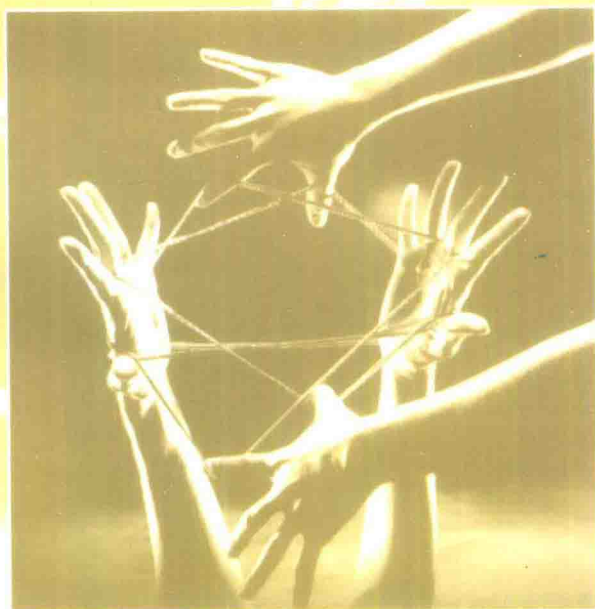




翻译与人生

周兆祥 著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翻 译 与 人 生

周兆祥 编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人生/周兆祥编著.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6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552-5

I. 翻… II. 周… III. 翻译理论 IV. H0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6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66168639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罗进德

责任校对/徐小美

排 版/中外名人研究中心

印 刷/北京密云银河商标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5.25

版 次/199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1998 年 8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552-5/H·194 定价:7.20 元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从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介绍中国 and 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认识到翻译对于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翻译对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专业素质、保证职业生涯顺利成功方面的宝贵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甚至少年人成了翻译的爱好者,他们要求学习翻译、研究翻译,有的立志投身翻译,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切合实用的翻译研究及学习读物,使学习和运用外语的水平更上一层楼。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二十多年来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肩负着翻译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广大翻译爱好者多么殷切的期望。

面对着我国又一次兴起的翻译高潮,铭记着翻译事业的崇高使命和我们对翻译界朋友的责任,我们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的基础上,郑重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自主策划,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继续及时反映译学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教学最新发展趋势,同时更多地关注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领域的实务,加强针对性,提高实用性,外译中与中译外并重。我们寄诚挚的期望于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希望朋友们帮助我们实现初衷,继续有所奉献于我国新时期的翻译事业。

编者 谨识

自序

我第一次学翻译,是三十多年前念中四,我们是香港中学生有机会念翻译的最后一届(只是在中四英文课上,我们的后一届就取消了)。当时教英文的凌老师高高瘦瘦的个子,相当有权威,也亲切有爱心,他大概是采用当时刚开始发展的比较语法的方法来教我们:英语的规矩是这样写的,汉语又是这样这样……。我们觉得蛮有兴趣,至少有机会又写中文又写英文,比一般的中文课英文课有新意,没那么闷。

进了大学,我们那一届大概又是香港最初有机会接受正式大学翻译教育的学生,当时翻译教育的研究还没开展,教的方法也传统保守,大家学着把原文一板一眼翻出来,忠于原著,当作者的传声筒。

在香港大学念了三年翻译,课堂上的习作几乎全是文学作品(诗、小说之类)和所谓实用性的文字(新闻、政府公文、会议记录),我的兴趣不大,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兴趣不大,后来才明白过来:因为没有机会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

翻译那些东西,是为了讨好老师,证明自己有功力,可是这些文字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是不大的,相信我们全班同学们当年都没有谁希望一生一世翻这些东西。(我们系内同届修翻译的二十多人,后来只有两三位从事传统式的翻译工作,其他的大部分当官、做生意、成为大机构高级行政人员,或到中学教语文。)

大学毕业(1970年)之前,每个念翻译的同学都要做一次“长篇翻译”,我挑了一本社会学的书,是谈为什么婚姻会出问题的科

学研究(叫《Marital Breakdown》),该书是香港公教婚姻辅导会希望中译出版,让本地的婚姻工作者使用,帮助婚姻出了问题的夫妇解决困难的,所以委托我这个学艺未精的小伙子翻译。那份差事竟然为我打开了一道门,看到原来翻译工作是可以“有用”的,即是说可以直接地造福社会。以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个道理!

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受香港基督教工人委员会委托,把一份英文手稿中译出版,原文叫《Workers, Know Your Rights!》,是港大法律系一位热心的讲师把工人们最需要知道的法例编起来,用最简洁的语言介绍,我叫这本小册子做《工人权益》,翻时觉得作者和出版者都功德无量,自己也沾了一点光。

翌年,亦即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前面提到那本婚姻病理学的书正式面世(因为篇幅大,又经多种谨慎审阅,所以前后搞了两年多近三年才出版),叫做《婚姻决裂》。同时,我也替该婚姻辅导会中译一套函授及小组都能用的儿童心理学课程共十册,叫《养儿育女》,是给一般为人父母者使用的教育材料。

不久,我做壮了胆,向公教婚姻辅导会提议在《公教报》(周报)开一个专栏,谈夫妇和谐相处、经营美满家庭之道,我把该会婚前教育课程的资料(全是英文的)整理起来,又不怕麻烦到港大中大图书馆社会学部门借了大本小本的有关学术研究,找出有用的资料,编译出一篇又一篇的专栏文字,于是那个《鸾凤和鸣》的专栏就以该会名义跟读者见面,一写就是三年。(当时我也知道是相当荒唐的事:自己毫无成家立室的一手经验,又未经社会学或社会工作训练,有的不过是一点点热情和差强人意的译艺而已。)

我一出道就有缘翻译这一类的东西(而不是文学作品、公文、法律、新闻、商业文件),得到了至为重要的启发:翻译工作是可以为社会大众相当直接地服务的,除了“搵食”之外,更可以是一种功德。

此后几年,我一边进修翻译理论,一边也留意世界各地最先进

的思潮，在香港比较开放的报刊发表专栏文章，介绍本地人鲜有机会接触的观点、资料、理解事物方法。到了1979年，毅然丢开事业，远赴英国读应用语言学，希望一边观摩西方人的办事及治学方式，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一边多学一招半式，好让自己做沟通文化的工作更事半功倍。果然，在英国的留学岁月给我相当大的冲击……。

大约是1983年的一个下午，我坐在英格兰剑桥镇郊区家里的后花园，正在翻译一些最新的思潮资料寄回香港发表，同时享受着彼邦夏日难得叫人狂喜的阳光，忽然有个意念涌上心头，或者说是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我和其他香港人一样，每天使用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两种语言（汉语、英语）：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有潜力让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看得明白。

那个时刻，我知道了自己正在做什么：让香港成为“南风窗”，引进现代世界，帮助祖国发展，令十二亿同胞生活改善，结束这个民族几百年的蹇运。

六十年代后期进入大学中文系念翻译、修中国文学的时候，我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抱负。

因缘际会，我终于发现了这件实在急需有人做、似乎没有谁在努力做、而自己大感兴趣的事情。

好像忽然找到了坚定的人生方向。

在那个后花园的铁椅上，望着刚剪平的草坪和几棵生机盎然的茛苕，我对自己说：以后写每一个字，都是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而写的。

大约在那个阶段，有机会跟欧洲的社会运动广泛接触，近距离观察人家正在做些什么、用什么手法去做，开始悟出一个规律：真正改变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其实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武力革命，也不是什么戏剧化的、物质层面的变动，而是社会集体意识的转变，尤其是深层的观念改变。

我逐渐开悟：翻译工作是文化引进的事业，可以成为救国救民

的济世工程；翻译工作者为自己的民族引进新的资讯、思潮、观念，帮助同胞跳出传统的思想束缚，采取符合当代社会需要的角度来认识理解事物，这样一个文明才可以向前迈进。

中国各地有许多志士仁人分头努力，但是也需要有同胞在香港和海外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方式合作，才事半功倍，因为我们在有些方面具备较优厚的条件（但在其他方面条件又差得多），例如较易获得新资讯，头脑自小比较解放、发表意见渠道较多等，可以为整个民族作出贡献。

像香港这种地方，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除了可以为中国引进外资、各种科技与生产管理的技术等等之外，更有意义的，是引进国际上最新的世界观。

1984年7月，一架珍宝客机把我们一家四口送回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结束了我浮游异域的五年“假期”。

我一直当这一段日子是生命的一次假期，丢开了工作，丢开了日常杂务，跑到天涯海角，躲起来读书、思考，抽空四出流浪，体验天地之大，认识外方朋友。正因为我抱这样的态度，从未想过丢弃香港或是放弃中国人的身份，鸟倦知还，自然斗志高昂地准备好面对新的奋斗和挑战。

如果说我的“绿色思想”是在留学期间由欧洲感染回来的，大概也多多少少合乎事实。

这五年的异域生涯中，我看到感受到几点：

第一、多年来由书刊中得知一二的种种运动潮流，例如反战、女权主义、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关心南方世界、简朴生活、素食主义等等，果然都是有生命又有意思的“斗争”，人家社会中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不同背景的组织，正在分头努力改善人类文明，其中很多志士仁人的才干与精神教人钦佩。

第二、西方社会的确问题多多，不少值得忧心忡忡，例如东西阵营对立冷战、环境破坏、南方世界天灾人祸频仍等，这些都是在

香港生活的人不易察觉、更难感受得到的。

第三、香港人那种人生观、世界观、生活方式，至为畸型变态，我们大半生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从来不懂得以世界居民、地球房客的身份来看问题，必须尽早改正，否则后果堪虞。

我旅欧那五年(1979至84年)，是全球反战浪潮与环境保护运动(environmentalism)大盛的时期。这些新兴的运动，其中最具政治性的那个反战运动(包括反对扩军、反对核武器、反对驻军外地等)，获得最多支持。

与此同时，环境保护运动也声势日盛，它吸引了各式各样背景的有心人，以不同的方式推动改革，包括激进的政治行动、低调的研究与教育工作、个人生活方式“静静起革命”等。

渐渐地，上述这许许多多不同形式、不同对象的运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全面的文明改革大潮流，史称“绿色运动”，这个转变正是在我到欧洲生活那一段时间发生的。

我并不是个躲起来啃书本的留学生或研究人员，而是抓紧每一个机会去了解当地社会的现象，既出于好奇，也相信对于自己将来做事有用。我不时踟躅于爱丁堡和剑桥市中心年青人聚集的区域，到各种非主流文化的店铺里泡，这种地方摆卖千奇百怪小众化的另类书刊，张贴各种小组组织的活动消息，各路英雄出出入入。除了仔细阅读各种组织的喉舌刊物及他们的“圣经”外，我也争取机会参加它们的聚会，跟负责人交流心得，认识他们的信念，冷眼旁观学习他们搞运动的手法。

这些“关系”不但大大丰富了我留学期间的生活，更激励我积极做人，矢志日后回港有所作为。

我们那一届港大中文系翻译班的同学，是本地(甚至全中国)最早在大专院校接受正规翻译教育的其中一群，在毕业的时候(1970年)，面前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当时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还未开始，港府很少雇用译员，地位亦不高，我对打政府

工毫无兴趣，所以从来未曾考虑过进政府做翻译工作。后来因为喜欢做教育工作，就先后在两间私校教英文中文，然后进中文大学做研究。

十四年之后，拿了英国的博士学位，飞回香港再次应聘于中文大学翻译系，我当时在飞机上想：五年末在欧洲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要自己“搅掂”自己的事，美国人不可能帮助意大利或埃及社会进步，印度人也不可能帮助加拿大进步，即使可能，他们也不会，如果谁自以为是，动手企图越俎代庖，后果往往是大灾难。

只有香港人可以救香港，只有中国人可以救中国。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盲点。如民族之中越多人看得出本身民族的缺点盲点，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想办法引进来以丰富自己的文化、提高同胞的思想水平，那么该民族进步的机会越大。

那时，1984年夏天，中英谈判结局明朗，虽然正式的《联合声明》还要等到年底才签署，香港回归祖国已成定局。一部分本地人心情惶惑，开始移民了。

我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返回香港，只是问余生在香港做些什么。学成归国回港定居对我来说是那么理所当然，就像口渴找水饮，饮完再上路一样，根本不用考虑，虽然父母亲友一直都说：在外地找到工作，可以安顿下来，就别回香港了。但是正如前述，五年的异域生涯令我深深体会到，人家的地方就是人家的地方，寄人篱下做二等三等公民终生痛苦，最大的痛苦恐怕是尽心竭力把社会搞好，始终还是不会变成你自己的（也许美加等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例外）。相反，如果在自己的地方，经过付出劳苦，即使有一点点的进步改善，那种满足感完全两样。何况，如果有能力的人都跑掉，抛下自己所隶属、情根深种的社会，即使生活舒适，也会因为只能共享福不能共患难而终生内疚。追求安逸一旦成为生命的最终目标，个

人舒适成为最高价值，人的存在就可悲可怜了。

于是，我们一家四口，女儿四岁，儿子四个半月大，在1984年“反方向移民”。由伦敦回香港的航程感觉上特别长，好像跨过了银河系那样，因为我在途中一直憧憬着未来发生的事。

那个时候我知道完全不可能想象未来几年或更长时间以后，自己会做些什么，可以做什么，只知道不会关在象牙塔内拒食人间烟火，我认为我们这一代面对剧烈震荡、瞬息万变、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应该拿得出与历史相称的豪情，塑造自己的角色，寻找自己的位置。

当时我清楚知道面前的道路不会平坦轻松，自己绝对不会选择闲逸、隔岸观火、自命清高。我估计大学的教席可以保证全家温饱，无需为生计奔波，那样就有更佳条件专心为社会做事了。

但是做些什么事、怎么做、有什么后果？当时真的半点头绪也没有。变数太多了，阔别五年之后对香港社会实况掌握有限，社会网络要从头建立，我没有心急迫自己做什么，反而一心一意开课、安顿下来、细心观察社会人事，看看将来有什么因缘。

欧游五年间，共写了约二百万字寄回香港发表（大部分在《信报》），其中除了一点点个人的见闻感受和文艺创作之外，都是介绍外地最新的思潮、资料、趋势，尤其是小众化趣味，但是潮流尖端大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主流部分的东西，当时我发觉原来所谓资讯发达又自由流动的香港，其实非常封闭，令香港人长期成为井底之蛙而不自知，究其原因商业利益垄断、加上港人短视又盲目无知，造成恶性循环，导致除了“大路货色”（如英国广播公司、《时代周刊》等）的消息之外，其余大家应该关心又需要深入认识了解的事情，资讯确实贫乏，比方说南北世界的矛盾、全球资源匮乏危机、超级大国扩军备战核子灾难威胁、西方医学的穷途末路、生态灾难的威胁、有机耕种复兴、饮食习惯革命（包括素食运动）、灵性关注的复归、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伊斯兰文化与政治势力抬头等。我在

英国住下来，马上眼界大开，逐一认识到它们对人类前途如何意义重大，觉得必须尽一点力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相信凭自己的文化与翻译训练与自小写作的兴趣，可以“拉头缆”，动手引进这些意念及关注。这些一直没有人做的工作，说不定由于我的尝试，而发扬光大，造福中国读者。

在那五年之内，我编译了一本介绍核子问题的书、一本介绍婴儿奶粉问题的书、两本介绍西方医疗问题的书、一本探讨电视本质的书、一本介绍绿色思想与生活的书、一本介绍冥想方法的书、就我所知，都是中文出版界的第一种，而且全是新鲜出炉的资料：我回港的时候，相信自己可以再接再励更多地做这种工作。

此后十四年(1984至98)，至执笔时为止，共出版了五十多种单行本，有编的、有写的、有翻译(英译中、中译英)的，它们的性质由书名可知一二，例如《医疗风暴》、《人民争取健康》、《免疫针危害健康》、《学校体育探究》、《灵修路上》、《冥想的欢乐》、《另一种生活价值》、《茹素策略》、《生机饮食手册》、《识饮识食：怎样提防日常进口的毒物》、《味精的争论》、《有机耕种：理论与实践》、《绿色政治》、《绿色思想》等。其中不少都是跟社会运动配合的，例如提倡环境保护、反对食物添加剂、提倡素食、提倡生态农业等，全都是致力结合国际间的最新思潮与东方(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希望尽一点绵力，促使社会在疾激转变之中，朝向较安全、较健康的方向前进，造福后代。这种工余的奋斗丰富了我的生命，叫我长期活得起劲，得到很大的满足，觉得自己“有用”，无愧此生。

1997年6月30日深夜，香港海港上空璀璨的烟花与暴雨争锋头，我坐在CNN(有线新闻网)电视台香港支部大本营的播音室里，盯着荧幕目睹一公里之外一面巨型英国国旗徐徐下降、中国国旗接着在国歌的旋律中升起，我尽力抑制内心的激动情绪，因为任务在身，负责同声传译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人的发言，而全世界都在这个历史时刻倾听着。我一方面庆幸他们的发言从翻译的

角度来讲(内涵、语调、演讲素质等)都难度很低,任何一位专业水平的译员做足准备都应该轻易过关;可是另一方面,想到有多少亿人在看现场直播,想到一百多年国耻此刻洗雪的历史感等等,肩上当即有千斤重担之感。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每一位译员都会有这样的经验,那个晚上的服务,是我事业的一个高峰,当编导说“*We sent you around the world*”(〔刚才〕我们已把你〔的声音〕放送到全球每个角落了)之时,我百感交集。这个全球性的电视台选了我这个殖民地土生土长的小子,用纯英国口音来发布那一段历史给五大洲的人民收听,真是一个缘分。我刚巧被挑选出来,义不容辞披甲上阵,在那个全民族、全世界注视着典礼上担当一个角色,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希望我的学生和所有日后有志加入这一行的朋友知道:这个岗位有时是十分刺激的,工作蛮有意义,在名与利之外可以给予从业员很大的满足感。谁都不知道,在生命途中哪一刻,历史会呼唤你,担当一个特别的角色,让你获得毕生难忘的经验——正如那个风雨之夜播音室里的我那样。

有一句西谚不断鼓舞着我:*It takes one finger to mend a dam.* (只需一只手指就能挽救一条堤坝。)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历史会要求自己的手指。人类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有义务准备应召。

我不时讲自己的“战绩”,为同行打气,是因为随着翻译工作全球逐渐职业化之后,从业员往往当自己是为糊口奔忙的雇佣兵,失去了理想,处处觉得自己“矮人一截”。

翻译行业亘古以来就是一个卑贱的行业,许多人都认为有本事的就去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三脚猫才去拾人牙慧替人传话(例如台湾一代著名诗人余光中就再三申明:有灵感时写诗,写散文,没有灵感时才翻译——作为练笔的功课之类)。说句老实话,当年我也是明知自己没有天才作诗作曲作画,才学做以为是卑微得多的翻译工作。

西方最有才华志气最大的翻译家不少都被活活烧死,被视为

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们的唯一罪行是在中古时代把《圣经》翻为本地的语言,让普罗大众无需经过教士的口,直接听到上天的讯息)。

此所以除了极少数的社会极少数的时代(例如玄奘那个时候)例外,翻译工作很少吸引到大才大智大勇者参与,结果造成恶性循环,为社会所鄙视。

可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许多时候偏偏却是靠着文化之间的沟通,造成相互冲击与杂交而得来的:玄奘、马可波罗、马丁路德、严复等人的贡献不易量度,但是大家只要想想若没有了他们,历史的轨迹将会如何不同,即可知一二了。

人类文明每一次大转变,各地文化每一次高潮,都是由新的哲学思潮带动的。新的哲学思潮,却往往是由全新的知识与智慧导致的新的观念与方法论的所带来的。

全新的知识与智慧,往往是由另一个文化的冲击而来,最明显的例子是佛教东传,让汉文化得到印度文化的启发,开出隋唐盛世的灿烂;中世纪因东方文明西传(包括印刷术和哲学等)而结束,激发出文艺复兴;近代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化”,也是西方科技文明东进的结果。

由那时到今天,人类文明大变特变,资讯社会来到,知识变成了重大的力量、最宝贵的产业、最厉害的武器。

与此同时,人间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哀鸿遍野的地方,各式各样灭绝性的大祸一触即发。人类科技不断复杂化,自己的智慧却未曾进步,结果大家失落在人工化世界的迷宫里,混混噩噩等待集体毁灭的末日。

就是在这样凶险气氛的背景之下,新一代的翻译工作者像漫画和电影里那位“超人”一样,负责扭转乾坤。当然他们比那位超人更伟大,因为他们不是英雄主义式的一飞冲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掌声雷动之中耍功夫,表演奇迹,反而集体默默耕耘,脚踏实地,一砖一石地建功立业,没有计较名誉、地位、金钱、喝彩。

人间目前这样危险，是因为大家缺乏沟通（虽然有那么发达的通讯设备）。

也是因为大家那么盲目无知（虽然有那么浩瀚无边的资讯）。

大家最需要得到知识，总是无法传播；大家最不可少，赖以求存的智慧，始终难以流传，更别奢望普及。

这是因为在目前这种社会制度、文化生态之中，传媒和教育工作者，只顾眼前的利益（特别是收视率与自身的事业前途），结果不用说，就是大家继续发民主自由开放的美梦，始终不明白何以人间的天灾人祸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心灵世界越来越可怖。

由于翻译工作的昌盛、进步、专业化，二十世纪末年世界各地社会知识、思想、心灵交流、热闹活跃，前所未见，特别是一直领导主宰全球文明的西方社会开始吸收东方玄学思想，各东方社会也向西方文明学习科学精神，互通有无，阴阳相济，人间正在开拓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理性灵性并重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工作一直穿针引线，纺织出美妙的新蓝图。

就是这样，沮丧惶恐的人类才敢怀着盼望，放开怀抱迎接第三个千禧年。

时至今日，资讯成为了社会上最强大的武器，最重要的资产。

由于工作所需，任务所在，现代的翻译工作者往往得天独厚，游弋于时代最尖端的知识、技术、思想中间。他们成为了资讯发布的枢纽，一方面个人有机会掌握宝贵的资源，活得精彩，不断看到自己传播的资讯在改造社会，开花结果，得到无比的满足；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工作的效率（能否方便快捷地沟通文明，把消息及时传到最需要的人手上和心里），处处影响地球这艘太空船上全体乘客的命运。

翻译者做原作者的奴隶那个时代开始结束，翻译工作的哲学正在跟人类文明一起过渡到脱胎换骨的新篇章。

有一个人走在路上看到三个在砌砖，于是，他过去问他们在